

癌症新闻叙事何以塑造公众 对循证健康政策的态度

——基于微博平台的调查实验

聂静虹 翟嘉靖

摘要:政策叙事是政府与公众互动的桥梁,在传达涉及科学不确定性的健康政策时,叙事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入了解公众对政策的认知和支持态度,不仅有助于优化宣传策略,也是提升政策效果的关键前提。以社交媒体癌症新闻为政策叙事载体,可探讨证据类型对公众政策认知与参与态度的影响,特别关注其与科学不确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对微博用户进行调查实验,研究发现,在癌症筛查与健康检查政策的传播过程中,科学不确定性会削弱轶事证据的倡导效果。这一过程是由公众的感知信任降低、对传播者公共服务动机的质疑和感知“标题党”所介导的。然而,统计证据可以有效缓解科学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通过采用政策叙事研究进路与行为科学的实验方法,不仅为健康政策传播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同时还可作为政策过程实践提供有效指导。

关键词:政策叙事;科学不确定性;循证健康政策;轶事证据;统计证据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5)03-0028-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XW082)

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与常规健康检查筛查对于改善居民健康状况、降低医疗保健开支具有重要意义。先前,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报告指出,健康知识普及、实施全民健身行动、癌症防治等15项专项行动具有重要意义,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认识到这一点,各级政府正在通过制定和实施强有力的预防医学政策,积极投身于健康促进活动。这包括发布公共健康信息,鼓励民众参与体育活动,提供健康生活方式的教育和资源,以及推广各种健康筛查项目,尤其是针对癌症这类可能通过早期发现和干预而得到有效控制的疾病。

通过信息传播来影响公众疾病认知与预防态度,是提升癌症筛查参与率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健康议题涉及个人的核心关切并与个体风险管理紧密相连,与之相关的科学证据的传播可以增进公众对医学信息的理解,促进个体认知与行为的改变,这符合循证健康政策的基本逻辑。另一方面,从不确定性沟通的视角来看,不确定性不仅存在于疾病的本质、治疗结果和医疗决策中,也影响着健康政策的制定和传播。这给政策制定者、公共卫生专家以及主流媒体向公众传达政策时带来了严峻挑战。在此过程中,传播者不仅需要及时更新和反映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还必须在保持信息准确性和避免提供过度确定性的结论之间找到平衡。因此,如何妥善处理 and 传达健康政策信息传播中科学的不确定性,成为获得公众信任和广泛政策支持、提高健康政策倡导效果的关键。

在健康传播与政策传播的背景下,如何激发公民政策支持意愿,提升公众的政策获得感,是将技术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议题。鉴于科学证据对于循证公共政策传播实践的重要性,以及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叙事转向,从政策叙事视角探究统计证据与叙事证据如何影响个体

政策认知、政策支持态度与政策参与意愿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社交媒体上的直肠癌预防政策新闻为窗口,探究不同程度的科学不确定性与不同证据类型框架的癌症新闻如何影响个体对癌症预防与筛查政策的认知、态度与支持意愿。

一、文献综述

(一) 政策叙事何以影响公众政策支持

政策叙事在塑造公众的价值观与行为意愿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它关注公共话语中社会问题的某些方面,同时定义问题本身、责任方并诊断问题的原因和潜在的解决方案^[2]。政策叙事框架(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指出,政策参与者使用故事(叙事)来影响政策制定过程。政策行动者通过将复杂的政策问题简化为具有背景、人物、情节和道德的故事,帮助人们理解这些问题,从而塑造公众对特定政策议题的认知与支持^[3-4]。当前,围绕政策叙事与公众政策支持的研究关注各种叙事元素、叙事情节、叙事情境对于公众支持应急政策^[5]、环保政策^[6]、社会信用体系政策^[7]、技术监管政策^[8]的影响。例如,通过在政策叙事中强调“宏大叙事”或者“切身利益”,可以促进不同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的公众对政策的接受度^[7]。另外,通过组合差异化的叙事主体和叙事情节,政府可以运用政策叙事这种柔性策略进行社会动员,以促进公众的亲社会行为^[5]。也有学者聚焦助推型政策,研究发现调整叙事中的受害者类型和数量,可以显著影响公众对减碳政策的支持态度^[6]。

社交媒体时代,新的信源形式和传播模式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已全面嵌入中国政治传播运行之中,促进了中国政治传播中的信息对流和政治互动^[9],丰富的媒介传播形式为健康传播和政策叙事提供了新的传播场所,也为观察政策参与者的行动策略提供了新思路。在公共卫生领域,现有关于健康政策的研究表明,尽管“免费体检计划”等健康政策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收益,其推广和普及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10]。由于缺乏对于健康检查有效性和必要性的认知,公众的低参与意愿会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11]。此外,目前我国健康科普政策更侧重于调节健康科普传播的输出面,而较少从传播的接收面考虑公众偏好和参与度^[12]。鉴于链接致病因素与患病结果的证据类型是一种关键的政策叙事方略,本研究重点关注不同证据类型与健康传播中固有的科学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公众对健康政策的支持意愿。

(二) 健康政策叙事:轶事证据还是统计证据?

循证公共政策强调以科学证据指导政策制定与政策传播实践。科学地追溯影响个体健康的机制和因果链条,是推动健康相关政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的必要制度安排,这不仅有利于为个体健康提供稳固的社会保障支持,而且对于提升公众整体健康状况具有深远的社会价值^[13]。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人们对社会现实的理解总是通过观念来中介的,因果论证在政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系统性作用。通过划定冲突范围、建立因果机制等手段进行政策叙事,是政策行动者传递政策信念、引导公众舆论的重要策略^[14-15]。

另外,社交媒体的迅速崛起极大地增强了健康信息的可获取性和普及性,使得公众能够更加广泛地参与公共卫生议题的讨论。这种趋势不仅激发人们对健康议题的广泛关注,也对政府决策者提出新的挑战,迫使他们在一个充斥着谣言、信息混杂的公共讨论空间中证明其政策决策的合理性。在这样的环境下,基于证据的决策成为一种关键策略,以满足公众对清晰、合理决策的不断增长的需求^[16]。

证据使用因果论证构建清晰的框架,通过将因果关系与各种形式的证据结合起来,政策制定者和卫生教育者可以更有效地传达健康风险和政策利益。更重要的是,一个清晰、基于证据的因果叙事能够帮助公众超越简单被动的政策接受,更深入地理解政策的科学基础和实际意义。这种理解不仅有利于促进更高层次的个人参与和公民责任感,还有利于为健康政策的接受和实施创建一个更完备的社会环境。统计证据(例如发病率与致病因素等定量数据)与轶事证据(叙述性描述等定性信

息)都是与政策相关的,且同等重要的证据类型^[17]。在健康政策传播中增加对证据的使用,对促进双向沟通,提高决策质量、促进政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18]。

当前,研究在轶事证据与个人叙事作为政策叙事框架的影响力方面存在争议。一些研究发现,在新闻报道中关注个人可以引起同情和共鸣,并激发公众的情绪反应^[19-20]。另外,轶事所需要的认知努力更少,因此在传递复杂因果信息时比其他形式更有效^[21]。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关于个体的故事可能会导致公众将问题归咎于故事中的人^[22-23],记者也可能会由于无意的错误阐释或有意的过度阐释得出没有根据的结论^[24]。这些争议提示,不同证据类型所涉及的信息处理机制存在差异。在接触轶事证据时,受众往往依赖直觉性思维,通过个体故事引发共鸣和情感反应,从而迅速形成态度判断;而在接触统计证据时,受众则更多依赖系统性思维,对数据和事实进行逻辑推理,以理性方式权衡因果关系。

(三) 科学不确定性水平的调节作用

受众在接触癌症新闻的过程中,不仅通过证据类型进行因果推断,还关注这些证据中所传递的科学不确定性水平。科学不确定性指的是由于科学证据的缺失或不足、证据或专家意见的冲突等原因,导致风险信息缺乏可靠性、可信度或充分性,从而产生一种模糊状态。

不确定性沟通在塑造政策叙事影响力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尽管人们力图减少生活中的复杂性与模糊性,以实现更清晰有效的决策规划,但在某些情境下,政府在清晰、开放的沟通中承认不确定性可以增强风险沟通中的信任^[27],并增加公众遵守未来危机沟通中政策倡导的可能性^[28]。一方面,决策者并不总是规避风险^[29]。前景理论指出,事件发生的结果概率会影响个体的不确定性偏好。当面对收益的前景时,个体厌恶不确定性,当面对损失的前景时,个体倾向于寻找不确定性,这是一种避免或减少损失可能性的偏好。此外,不确定性能使人们保持希望和乐观^[30]。有研究建议,政策制定者在沟通有关科学的不确定性时,应当向公众承认,他们无法对问题的发生概率进行精确估计^[31]。因为如果后续科学研究呈现出了与政策传播中不一致的结论,会导致公众对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的信任降低。

不同类型的证据在论证因果关系时,所传递的科学不确定性程度是影响叙事效果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不确定性会激活特定的思考目标,出于削减不确定性的需求,个体会调整自己的认知策略选择。包括更抽象化地思考问题和更多的认知投入等^[25-26]。另一方面,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信息处理的阻碍,使得受众对于该信息感到困惑或不信任。特别是在公众对某一主题知之甚少的情况下,高度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恐惧、混淆或忽视信息。因此,证据类型可能会调节受众对充斥科学不确定性的政策信息的态度。使用统计数据 and 事实,可能为公众提供更明确、客观的信息,但如果过于复杂或超出大多数人的理解范围,那么这种信息可能会被忽视或误解。相比之下,轶事证据,如个人故事或经验,可能会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但也可能缺乏客观性和普遍性。据此,本研究假设:

H1:当癌症新闻所传递的科学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统计证据(相比于轶事证据)会增加受众对癌症相关健康政策的支持意愿

H2:当癌症新闻所传递的科学不确定性程度较低时,轶事证据(相比于统计证据)会增加受众对癌症相关健康政策的支持意愿

(四) 动机推理作为中介

探究个体的信息处理过程对于理解行为结果至关重要,明确公众对癌症新闻信息的处理机制是了解政策态度形成过程的重要一环。具体到涉及科学不确定性的政策沟通过程中,模糊描述的科学信息可能会引发公众的多样化动机解读,特别是当这些解读受到个人之前的信仰或认知的影响时。这种多样性在信息解释上的差异可能会导致沟通障碍,使得不同的人基于相同的不确定性信息得出不同的结论^[32]。动机推理理论指出,当个体面对与个人认知信念不一致的信息时,为了避免认知失调,会倾向于放弃准确性目标和结果,而对信息进行有偏见的认知加工与处理^[33-34]。另外,先前研究

发现,那些知识渊博关心政治的公众,在面对不一致的健康信息时,更倾向于依靠自身信仰和态度处理信息,这种有动机的偏见深刻地塑造了人们对健康政策的认知,以及对于或倡导或批判这些政策的倡导联盟的态度^[35]。

不确定性管理的研究显示,人们对信息来源的态度会影响他们对信息本身可信度和质量的判断^[36]。另外,不确定性是引发这种有动机的信息管理的关键因素,个体出于避免认知失调、维持自身信念以及意识形态驱动等原因,会通过信息情境或信源进行认知重新评估来减少不确定性^[37]。在癌症信息传播与癌症相关政策倡导这类高风险传播情境中,不确定性会激发受众的动机推理。那些导致不确定性和混淆的健康新闻会激发动机推理^[38],进而导致受众对新闻可信度的怀疑和对建议行动的抵抗。但这些研究往往视健康新闻中的新颖性为负面偏见,从而忽略其在传递健康知识和引发受众注意力方面的独特作用。同时,当传递相同因果知识的新闻中使用不同的证据类型时,受众感到新奇与怀疑之间的界限还不清楚。在之前的健康政策传播研究中,学者们主要考虑受众对新闻内容的信任、态度等对说服效果和政策支持的影响。然而,研究受众对新闻提供者意图的深入解读,及其对说服力的作用,也尤为关键^[39]。

本研究将动机推理理论与受众对信源动机归因的研究结合起来,探索癌症新闻不确定性程度与叙事框架影响公众政策支持意愿的三个潜在中介——感知信任、感知记者公共服务动机和感知“标题党”。

当健康建议随着新的科学证据的出现而迅速变化时,仅通过强调信息的准确性可能无法抵制错误信息的传播^[40]。“信任”被视为一种内在的心理过程,在减少公众的感知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中承担重要功能,尤其是在影响受众对消息来源和科学问题的态度方面至关重要。另外,信任是减少公众动机推理的重要边界条件^[41-42]。有实证证据表明,受众对政策信息的接受度是通过感知来源可信度机制发挥作用的^[43],不确定沟通积极影响公众对传者可信度的感知^[44],因为披露科学不确定性可能会让公众感知信息主体更客观更少偏见^[45],从而增加他们对倡导行为的遵从意愿^[46]。也有研究表明,通过数字范围传达不确定性对于某些公众来说意味着不诚实和没有能力^[47]。进一步地,学者们通过对传递科学不确定性时的叙事格式进行分类——口头表达型(“也许”“大概”等)和数字型,从而为不确定性影响信任的矛盾研究寻求多维解释。有研究建议以数字方式传达不确定性更为可取,但也有学者发现不同受众对数值不确定性存在重大的解释区间,受众对数字的理解存在较大偏差^[48-49]。

鉴于这些复杂的发现,有研究提出,在癌症新闻传播与政策倡导中,证据类型对公众政策支持意愿的影响受到科学不确定水平的调节,这一过程受到公众感知信任的中介。本研究假设:

H3:统计证据可能会在科学不确定性水平高的情况下引起受众的感知信任,从而增强癌症新闻的政策倡导效果

本研究关注癌症新闻报道中的科学不确定性披露和证据类型对政策倡导效果的影响,并从受众动机推理的角度寻求这一过程的解释机制。有研究发现,公众对传播者的角色认知会影响他们对新闻的解读,例如,政府支持者与批评者分别因为其感知的倡导动机和感知的辩护动机,可能会将新闻视作假新闻^[50]。考虑到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以及轶事证据与科学严谨性之间的巨大张力,当癌症新闻中涉及科学不确定性并选用轶事证据时,可能会激起受众的疑虑^[51]。这样的报道方式可能增强受众的宿命论观点^[43],并让受众认为新闻的目标更多是为了说服,而非真正的知识传递。在此背景下,当轶事证据被用于传递高度的科学不确定性时,受众可能会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认为这是记者为了吸引眼球,采取“标题党”策略,这会进一步降低新闻的政策倡导效果。

然而,当科学不确定性通过统计证据呈现时,其背后所具有的客观性质,可能会使受众相信,记者在尚未达到明确结论的科学研究背景下报道癌症,是为了满足公众对及时的科学研究结论和新闻的需求,从而理解这种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公众常常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形成推断来应对不确定

性,以填补信息的缺失,减轻其所感受到的不确定性。再者,以负面方式框架的癌症风险信息会促使受众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而统计证据更能满足受众的这种深入的认知需求^[52]。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 轶事证据可能会在科学不确定性水平高的情况下引起受众的感知“标题党”,从而降低癌症新闻的政策倡导效果

H5: 统计证据可能会在科学不确定性水平高的情况下引起受众的感知公共服务动机,从而增强癌症新闻的政策倡导效果

二、研究方法

以微博情景的癌症新闻接触为背景,当前研究采用 2(证据类型:轶事证据 vs. 统计证据)×2(科学不确定性:高 vs. 低)的被试间实验设计。根据 G * Power 3.1 软件^[53]测算得知,当 $\alpha=0.25, 1-\beta=0.8$ 时,最小计划样本量为 128。本研究借助见数平台进行被试招募,每位通过注意力检测并完成整个实验的被试均获得了 6 元报酬。290 名被试(女性占比 64.1%, $M_{\text{年龄}}=26.7, SD=6.51$)被随机分配到 4 个不同的直肠癌发病因素相关的新闻情境中。在实验开始之前,被试被告知要想象自己正在浏览微博,然后浏览为实验设计的新闻报道。在阅读完新闻后,被试需要回答一系列问题,用于检查实验的操纵效果以及测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为了确保操纵效果,研究选取真实报道过的癌症新闻,并进行适当的微调措辞以满足实验的需求。所有调整后的新闻文章都标明其信息来源为《生命时报》。在操纵检验之后,被试回答关于以下中介变量的问题:感知信任度、感知记者的公共服务动机以及感知“标题党”的程度。最后,被试评估他们对相关政策的支持意愿,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并报告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癌症焦虑水平、媒介素养作为协变量。具体的变量操纵方法与信度检验结果如表 1。

表 1 操控变量的文本描述与条件分组

变量操纵		
科学不确定性	[低]肠息肉癌变直肠癌	[高]吃肉直肠癌
轶事证据	<p>#男子肠息肉十年没复查变直肠癌#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微生态环境,对人体的健康和寿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直肠癌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p> <p>“2 厘米的息肉,你还敢在肚子里养十年,人家一点点小就赶紧切了!”早在 2013 年,上海的方先生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体检时做了肠癌筛查,发现了一处肠息肉,心存侥幸心理的他直到症状加重才再次就医。医生强调:“有些肠息肉属于肠癌的癌前病变,若不及早进行干预,患者将有极大可能发展为肠癌,所以需要引起警惕。”不久前,浙二消化内科医生取出方先生体内的癌变组织。</p> <p>专家建议,免费开展特定人群胃肠镜筛查,定期进行肠镜体检,及早发现肠息肉,可以有效预防直肠癌的发生。(记者李伟南《生命时报》)</p>	<p>#夫妻或因无肉不欢患直肠癌#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微生态环境,对人体的健康和寿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直肠癌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p> <p>今年 6 月,在杭州工作的李爱花发现自己排便出现异常,出现变细、变黏,后来又出现黑便,去就医被确诊为直肠癌。而在 3 个月后,李爱花的丈夫也被确诊为直肠癌肝转移。经过医生的咨询,夫妻俩没有家族史,大概率是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引起,夫妻两人平时都是无肉不欢。而长期高脂肪饮食,有可能加重肠道负担,有一定概率诱发肠癌。</p> <p>专家指出,做好营养工作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基础。通过食品包装标签设计等政策干预,可以改善公众健康膳食模式,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肉食,可以有效预防直肠癌的发生。(记者李伟南《生命时报》)</p>

续表

<p>统计证据</p>	<p>#90%以上直肠癌源于息肉癌变#肠道是人体内最大的微生态环境,对人体的健康和寿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直肠癌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p> <p>随着生活方式日益西方化及老龄化的加剧,以上海为例,大肠癌发病率以每年 4.2% 低速度持续上升,但早期诊断比例却不足 10%。在东部地区,它已位居肿瘤发病率第二位。80%~90%的肠癌是由“息肉恶变”产生的,从息肉到癌症,这个过程很漫长,至少需要 10 年。如果能在此期间及时排除隐患,就能大大降低恶变风险。</p> <p>专家建议,免费开展特定人群胃肠镜筛查,定期进行肠镜体检,及早发现肠息肉,可以有效预防直肠癌的发生。(记者李伟南《生命时报》)</p>	<p>#摄入过多肉类可能增加 18% 患直肠癌概率#肠道是人体内最大的微生态环境,对人体的健康和寿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直肠癌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p> <p>世界卫生组织(WHO)在 26 日发表的最新报告中说,吃加工肉例如培根、香肠以及火腿可能增加患癌的风险。一天吃 50 克的加工肉,即两片培根,大概可以增加患直肠癌 18% 的概率。在如今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人们的饮食结构愈发高脂肪高蛋白化,更易诱发癌变。</p> <p>专家指出,做好营养工作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基础。通过食品包装标签设计等政策干预,可以改善公众健康膳食模式,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肉食,可以有效预防直肠癌的发生。(记者李伟南《生命时报》)</p>
-------------	--	---

表 2 测量题项及其信度指标

变量	测量	信度系数
<p>科学不确定性^[54] (自变量)</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我觉得我对直肠癌的原因不甚了解 2. 新闻中提到的原因(肠息肉/摄入过多肉类)不足以解释直肠癌为什么会发生 3. 这条新闻让我对直肠癌发生的原因更困惑了 4. 新闻中提到的原因(肠息肉/摄入过多肉类)与直肠癌的关系很弱 5. 这条新闻也不确定肠息肉/摄入过多肉类是不是导致直肠癌发生的主要原因 6. 我觉得这条新闻让我对直肠癌的原因有很好的了解 7. 这条新闻让我对直肠癌的原因有了更好的了解 8. 这条新闻让我觉得我了解直肠癌发生的原因 	<p>0.83</p>
<p>感知信任^[55]</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这则新闻所传递的健康知识是可信的 2. 这则新闻所传递的健康知识是准确的 3. 这则新闻所传递的健康知识是值得信赖的 4. 这则新闻所传递的健康知识是有偏见的 5. 这则新闻所传递的健康知识是完整的 	<p>0.89</p>
<p>感知记者公共服务动机^[50]</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记者和媒体报道这则新闻是为了满足我们这群读者获取健康信息的需求 2. 记者和媒体报道这则新闻是为了迎合我们对这类新闻的偏好 3. 记者和媒体报道这则新闻是为了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和健康知识水平 4. 记者和媒体很关注公众的健康状况 5. 记者和媒体希望通过新闻传递的健康知识改善公众的健康状况 	<p>0.78</p>
<p>感知 “标题党”^[56-57]</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如果我在热搜上看到这则话题,我会觉得它是为了吸引我点击它而不是传达信息 2. 如果我在热搜上看到这则话题,我会觉得它旨在在尽可能获取点击量和关注度,通常是为了商业利益,如广告收入 3. 如果我在热搜上看到这则话题,我会觉得它夸大或隐瞒一些信息以引起我的注意力和好奇心 4. 如果我在热搜上看到这则话题,我会觉得它试图吸引我打开全文内容 	<p>0.77</p>

续表

变量	测量	信度系数
政策支持意愿 ^[21]	1. 中国政府应该免费开展针对特定人群的肠镜筛查活动 2. 中国政府应该通过食品包装标签设计等政策干预,让人们少吃肉 3. 新闻中所提到的政策呼吁是为了解决直肠癌问题提出的 4. 新闻中提到的健康政策被专家判断为在政策执行上是可行的 5. 新闻中提到的健康政策有潜力降低直肠癌发病率 6. 新闻中提到的健康政策有潜力提高直肠癌筛查率	0.90
癌症焦虑 ^[58]	1. 一想到直肠癌我就害怕 2. 一想到直肠癌我就感到紧张 3. 一想到直肠癌我就心跳加速	0.79
媒介素养 ^[59]	1. 我会使用多种媒体来源跟踪新闻 2. 我会和我的家人或朋友交流我在媒体上看到的新闻 3. 我会提醒身边的人媒体的负面影响	0.88

三、研究结果

(一) 操纵检验

阅读高科学不确定性癌症新闻的被试报告其感知科学不确定性更高 ($M_{低} = 3.14, SD_{低} = 0.97, M_{高} = 3.46, SD_{高} = 1.03, t(288) = 2.72, p = 0.007$)。阅读轶事证据的被试报告新闻包含更多的轶事证据 ($M = 5.68, SD = 1.26$) 而非统计证据 ($M = 3.57, SD = 1.94, t(288) = 11.05, p < 0.001$)。而阅读统计证据的参与者则报告新闻包含更多的统计证据 ($M = 5.66, SD = 1.41$) 而非轶事证据 ($M = 3.75, SD = 1.94, t(288) = 9.596, p < 0.001$)。另外,对证据类型的操纵不影响参与者对科学不确定性的感知 ($t(288) = 0.35, p = 0.726$),且对科学不确定性的操纵也未影响对证据类型的判断。

(二) 证据类型对消息效果的影响

采用协方差分析检验科学不确定性、证据类型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将癌症焦虑、媒介素养、年龄、性别、收入、受教育水平作为协变量,协方差分析的结果如图 1 所示。行为意图显示了预期的双向交互作用。简单效应分析的结果支持 H1,当癌症新闻所传递的科学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统计证据引发了更高水平的健康政策支持意愿。其次,H2 没有得到支持,当披露的科学不确定性水平较低时,证据类型不影响受众对其倡导的健康政策的支持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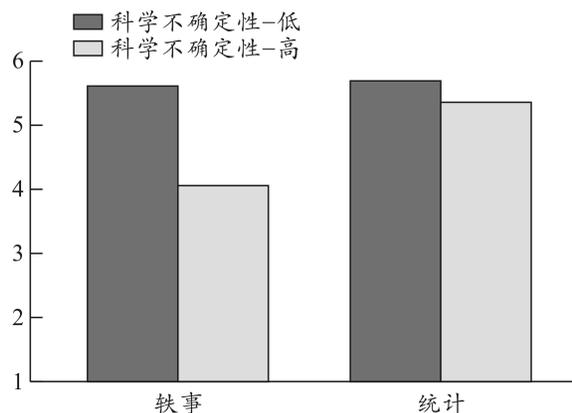


图 1 证据类型及科学不确定性的交互效应

(三) 中介机制检验

研究接着使用 PROCESS(model 7) 运行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显示,当证据类型为轶事时,感知“标题党”加剧科学不确定性对政策支持消极影响。另外,参与者阅读轶事证据的癌症新闻时,高科学不确定性增强了他们的感知“标题党”,但在统计证据下没有。进一步的分析揭示,参与者在阅读轶事证据的癌症新闻时,高科学不确定性降低他们的感知信任和感知记者公共服务动机,但在统计证据下没有。

接下来,在单一回归中,以政策支持意愿为因变量预测自变量、两个中介和所有的交互作用,感知的“标题党”和感知的记者公共服务动机都是显著的预测因子。此外,中介分析的结果显示(Bootstrapping 样本量设置为 5000),在采用轶事证据的癌症新闻中,科学不确定性通过降低感知记者公共服务动机(感知可信度)负向影响政策支持意愿,科学不确定性通过增加感知“标题党”负向影响政策支持意愿,从而证实了假设 4。但是,研究并没有找到在统计证据背景下感知记者公共服务动机和感知信任的中介作用的证据。因此,只有当癌症新闻采用轶事证据时,感知“标题党”、感知记者公共服务动机、感知可信度才中介了科学不确定性对政策支持意愿的影响。

表 3 感知“标题党”的有调节的中介分析

	coeff	se	t	p	LLCI	ULCI
科学不确定性→感知“标题党”	2.789	0.400	6.752	0.000	2.002	3.577
证据类型→感知“标题党”	1.157	0.388	2.979	0.003	0.393	1.922
交互项→感知“标题党”	-1.360	0.249	-5.449	0.000	-1.852	-0.869
感知“标题党”→政策支持意愿	-0.169	0.041	-4.114	0.000	-0.249	-0.088
科学不确定性→政策支持意愿	-0.644	0.085	-7.606	0.000	-0.811	-0.477
科学不确定性的直接效应	-0.644	0.085	-7.606	0.000	-0.811	-0.477

表 4 感知信任的有调节的中介分析

	coeff	se	t	p	LLCI	ULCI
科学不确定性→感知信任	-2.109	0.312	-6.767	0.000	-2.722	-1.495
证据类型→感知信任	-1.049	0.303	-3.470	0.001	-1.645	-0.454
交互项→感知信任	1.135	0.195	5.836	0.000	0.752	1.518
感知信任→政策支持意愿	0.413	0.059	6.977	0.000	0.297	0.530
科学不确定性→政策支持意愿	-0.644	0.085	-7.606	0.000	-0.811	-0.477
科学不确定性的直接效应	-0.644	0.085	-7.606	0.000	-0.811	-0.477

表 5 感知记者公共服务动机的有调节的中介分析

	coeff	se	t	p	LLCI	ULCI
科学不确定性→感知记者公共服务动机	-2.327	0.332	-7.004	0.000	-2.981	-1.673
证据类型→感知记者公共服务动机	-1.038	0.323	-3.219	0.001	-1.673	-0.403
交互项→感知记者公共服务动机	1.212	0.207	5.845	0.000	0.804	1.619
感知记者公共服务动机→政策支持意愿	0.312	0.055	5.692	0.000	0.204	0.419
科学不确定性→政策支持意愿	-0.644	0.085	-7.606	0.000	-0.811	-0.477
科学不确定性的直接效应	-0.644	0.085	-7.606	0.000	-0.811	-0.477

表6 科学不确定性影响政策支持意愿的有调节的中介分析

证据类型		中介 1:感知公共服务动机				中介 2:感知“标题党”			
		IE	SE	CI(95%)		IE	SE	CI(95%)	
科学不 确定性	轶事证据	-0.348*	0.086	-0.528	-0.191	-0.241*	0.081	-0.415	-0.097
	统计证据	0.030	0.045	-0.056	0.122	-0.012	0.029	-0.072	0.046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标		0.378*	0.101	0.303	0.591	0.229*	0.085	0.084	0.420

表7 科学不确定性影响政策支持意愿的有调节的中介分析

证据类型		中介 3:感知信任				
		IE	SE	CI(95%)		
科学不 确定性	轶事证据	-0.403*	0.092	-0.595		-0.236
	统计证据	0.067	0.061	-0.045		0.199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标		0.469*	0.124	0.253		0.735

四、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政策叙事框架与动机推理理论,以癌症预防筛查为政策背景,通过研究公众对社交媒体平台癌症新闻的认知评价,深入探索证据类型及科学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公众对循证健康政策的支持意愿。研究表明,政策叙事的证据类型对政策支持态度的影响受到科学不确定性的调节。具体来说,与先前强调轶事证据负面影响的研究一致^[60-61],实验结果表明,当癌症新闻所传递的科学不确定性水平较高时,使用轶事证据会降低公众对健康政策的支持意愿。这可能是因为轶事证据通常是个体化的、情感导向的,当加入不确定性因素时,它可能使得新闻显得不够可靠或有误导性。这一点在进一步的中介分析中得到印证——高科学不确定性的轶事证据会触发受众的感知“标题党”,他们可能认为这些新闻是为了吸引关注而夸大事实,进而降低对癌症新闻所倡导的健康政策的支持意愿。

在健康说服领域对证据类型的研究中,本研究的发现与已有文献存在分歧。先前的研究显示,在高情感投入的健康议题中,轶事证据的效果可能超过统计证据^[62]。但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涉及科学不确定性的健康政策沟通中,统计证据更能有效提升公众对政策的支持态度。这与循证公共政策研究的基本假设相契合,即强调政策制定需基于科学的程序和实证方法^[63]。在此背景下,传播策略也需要循证。政策制定者和新闻媒体在传播过程中的协同工作尤为关键。尽管循证公共政策强调基于科学的方法,但在选择证据类型时,相对于轶事证据,统计证据更能中和科学不确定性的潜在负面影响。这与已有研究发现一致,该研究的结果显示,当人们接受与不确定性相关的信息时,他们确实会感知到更高的不确定性。然而,这种感知的不确定性只会显著削弱公众对口头表达不确定性的信任,但就数字形式的不确定性而言,受众对信息和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只有微弱的减少。这暗示,尽管不确定性的传达可能会影响公众的信任感,但其影响可能比预期的要小,并且取决于不确定性信息的呈现方式^[64]。因此,在科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使用统计证据的信息并不会明显影响公众的支持意愿。这或许可以归因于统计证据所带有的客观性光环效应,从而提高了公众信任。

癌症筛查与预防政策的宣传是一场全民动员的系统性工作,它要求信息和知识畅通无阻地传递以及全民的积极参与。这不仅能够显著提升癌症预防的实际效果,还能够有效降低因癌症而产生的公共医疗费用。根据本研究发现,政策叙事作为一种有效的沟通工具,可以为政策传播者提供以下

几点有用见解。

第一,各级公共部门在进行健康政策宣传时,可以通过适当的科学不确定性披露与证据类型组合来提高公众的参与和支持意愿。尽管先前以城市数字化转型为政策背景的叙事研究指出,“进步”的轶事证据比科学证据更有说服力^[1],但在涉及癌症筛查与健康检查这类高风险、高个人威胁的政策传播中,轶事证据相对于科学证据的优势并不明显,尤其是证据所论证的因果关系涉及高科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因此,政策传播者需要谨慎处理叙事策略的组合与选择,平衡科学研究与统计数据的枯燥、难以理解,以及轶事证据可能引发的感知“标题党”。

第二,健康政策传播过程中是否需要向公众披露科学不确定性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虽然在医疗情境中,表达不确定性被视为可以增进患者信任^[65],促进更知情的决策参与^[66],减少公众的心理抵抗。但在政策传播情景中,表达科学不确定性会引发公众对传播者倡导动机的质疑,尤其是当传递不确定性与轶事证据搭配使用时。这提示政府及政策传播者在公开透明地展示政策制定的考虑和依据时,不仅需要通过叙事明确解释政策目标及预期成果,让公众理解政策制定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还应该考虑采用统计证据而非轶事证据增进患者的信任。

第三,面对公众对健康检查的恐惧或误解,以及可能存在的积极偏见,好的政策叙事可以帮助公众克服抵触情绪,更容易接受预防措施并支持社会层面的预防政策。这需要政策主体转变传统的科层制传播思维,避免因为公众参与环节缺失导致政策认同感低。一方面,社交媒体情境改变了传统的政策传播逻辑框架,“控制和宣传”等传者本位的政治传播思路正在朝向“协商与互动”的双向对话模式转变^[67]。尽管在互动过程中,轶事证据在增进公众理解以及促进参与讨论方面有优势,但需要注意,这种证据类型不适合传递隐含高科学不确定性的健康政策信息。通过使用恰当的政策叙事,公共部门和政策传播者可以更有效地与公众沟通,提升政策的接受度和执行效果,尤其在健康预防政策这一关键领域。

(二)理论意义

从理论角度看,本研究的发现为微观层面的政策叙事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之前的 NPF 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叙事与政策支持意愿之间的直接关联,但本研究首次尝试将动机推理理论纳入政策叙事框架,揭示从政策叙事到政策支持意图之间的三重心理过程。感知传播者公共服务动机和感知“标题党”这两个新概念为政策传播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在社交媒体的背景下,健康政策信息要真正获得公众赞同和支持,需要以公共服务意识的理念为指导,避免使用一时吸引眼球的“标题党”策略。同时,证据类型和科学不确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为我们提供了线索,解释了为何不同的叙事结构可能会导致公众产生不同的政策支持倾向。此外,探索如何精准构建政策叙事以增强公众的政策认知和支持,可以为未来的政策传播研究提供更多理论洞见。

(三)实践意义

先前从政策工具视角对我国癌症防治国家政策进行文本分析的研究发现,目前的政策文本中,宫颈癌、乳腺癌、上消化道癌等的提及次数较多,重视程度较高,但结直肠癌提及次数较少。直肠癌作为一种高发病率、高治疗成本的癌症类型,早期筛查对于提升患者生存质量和降低公共医疗支出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对直肠癌筛查及预防政策的公众态度进行实证研究,指出科学不确定性在健康政策的沟通过程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为了提高健康政策的公众支持度与参与意愿,政策主体和新闻媒体需要重新考虑和调整传播策略。以下是基于本研究发现的一些政策启示:

第一,在涉及科学不确定性的健康政策传播中,应优先考虑使用统计证据。统计证据的客观性能够增加公众的信任度,对抗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同时,政策制定者应确保提供的统计数据是可靠、准确且最新的,避免造成误导。第二,公众有对不确定性的知情权,政策主体应确保在沟通过程中公开、完整地披露所有与政策相关的科学数据和研究,以此增加政策的透明度,进而增强公众的信任。第三,社交媒体作为公共政策传播的重要渠道,极大地拓展了政策传播途径。但与此同时,社交

媒体上充斥的虚假健康信息会导致公众感知信息过载,通过科学的传播策略组合与政策叙事,政府可以联动多平台从而实现政策传播效果优化。对政策制定者与政策传播实践者而言,只有当信息传递透明且准确,同时又能认真对待科学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时,公众才更可能信任并支持政策倡议。这不仅能促进特定健康行为的改变,还能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推动健康意识的提升。

(四)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本文以微博用户为研究对象,这可能导致样本的代表性有限,不一定能广泛代表整个社会的观点和态度。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纳入其他社交媒体用户样本,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其次,本研究仅聚焦于直肠癌这一类型的癌症政策支持,单一类型情境可能会导致一些混淆变量影响研究结论,比如,被试的直肠癌家族史、被试的感知直肠癌风险因素等,为尽可能规避这些混淆变量的影响,本研究将癌症焦虑水平和媒介素养纳入协变量,未来研究可以在多类型癌症政策情境中进一步对科学不确定性披露的效果进行检验。再次,本研究关注的是公众的政策支持意愿而不是实际的政策参与,尽管先前研究表明政策支持意愿与实际的政策参与关联度很高,但控制实验中测量的公众意愿可能存在期望偏差,未来的研究应采用更丰富的测量方法来衡量公众对直肠癌筛查与预防政策的支持意愿。另外,本研究是从心理视角来探究信息叙事对个体认知与态度的影响,未来可以从社会文化因素、经济因素等角度展开更丰富的研究。最后,尽管本研究利用当前证据类型文献与动机推理理论,确定不同证据类型对科学不确定性影响公众政策态度的调节作用,但可能还存在其他的调节因素影响科学不确定性与公众政策支持意愿的关系,例如情感卷入度、证据呈现的格式^[68]、论证类型^[69]等。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叙事类型与科学不确定性影响公众政策态度这一过程的其他调节因素。

参考文献:

- [1] 张扬,秦川申. 政策叙事、公众态度与支持行为倾向——基于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调查实验. 公共行政评论, 2022, 3: 140-160+199-200.
- [2] R. M. Entman.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3, 43(4): 51-58.
- [3] M. D. Jones. "Communicating Climate Change: Are Stories Better Than 'Just the Facts'?"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14, 42(4): 644-673.
- [4] E. A. Shanahan, M. D. Jones, M. K. McBeth, et al. *The 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C. M. Weible, P. A. Sabatier.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173-213.
- [5] 郑桂贤,欧昊麟,钟爽. 公共危机中政策叙事如何助推亲社会行为——一项调查实验. 公共管理评论, 2024, 1: 88-116.
- [6] 刘展余,雷玉琼. 政策叙事中的受害者与公众政策支持:基于助推型减碳政策的实验研究. 公共管理评论, 2024, 1: 165-191.
- [7] 郭跃,邓仪正,付雪聪. "宏大叙事"与"切身利益":政策接受度的多层次比较分析. 公共行政评论, 2023, 5: 67-85+197.
- [8] 秦川申,刘运喆. 人脸识别风险沟通中叙事情节的作用:基于一项调查实验. 公共管理评论, 2023, 3: 31-56.
- [9] 于淑婧,荆学民. 政党领导的交流秩序: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的运行特质. 行政论坛, 2021, 4: 7.
- [10] 马超,赵双雨,唐润宇. 上医治未病:免费体检计划对老年人医疗服务与健康福利的影响. 管理世界, 2023, 12: 144-166.
- [11] 李佩瑶,许兴龙,杨心悦. 基本公共卫生健康体检政策执行偏差及对策——基于W农村的案例研究.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24, 6: 686-689.
- [12] 陈敏贤,王焕景,郭顺利.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健康科普政策文本内容量化分析.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24, 5: 560-564.
- [13] 任国强,王于丹,周云波. 科学研究中因果推断的方法、应用与展望——以个体健康研究为例. 人口与经济, 2022, 2: 1-25.

- [14] D. A. Stone. Causal Stor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Policy Agenda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89, 104(2) : 281-300.
- [15] 明翠琴. 政策科学中的叙事政策框架及其研究前沿.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2019, 2: 10.
- [16] M. J. Dobrow, V. Goel, R. E. G. Upshur. Evidence-based Health Policy: Context and Utilisation.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004, 58(1) : 207-217.
- [17] R. C. Brownson, J. F. Chiqui, K. A. Stamatakis. Understanding Evidence-based Public Health Polic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9, 99(9) : 1576-1583.
- [18] D. M. Campbell, S. Redman, L. Jorm, et al. Increasing the Use of Evidence in Health Policy: Practice and Views of Policy Makers and Researcher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Health Policy*, 2009, 6(1) : 1-11.
- [19] T. C. Schelling. The Life You Save May Be Your Own. *Problems in Public Expenditure*, 1968: 127-162.
- [20] D. A. Small, G. Loewenstein. Helping a Victim or Helping the Victim: Altruism and Identifiability.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2003, 26: 5-16.
- [21] J. Niederdeppe, M. A. Shapiro, H. K. Kim, et al. Narrative Persuasion, Causality, Complex Integration, and Support for Obesity Policy.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4, 29(5) : 431-444.
- [22] C. L. Barry, V. L. Brescoll, S. E. Gollust. Framing Childhood Obesity: How Individualizing the Problem Affects Public Support for Preven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2013, 34(3) : 327-349.
- [23] S. Iyengar. *Is Anyone Responsible? How Television Frames Political Issu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1-16.
- [24] C. Orellana-Rodriguez, D. Greene, M. T. Keane. Spreading the News: How Can Journalists Gain More Engagement for Their Tweets? In *Proceedings of the 8th ACM Conference on Web Science*, 2016: 107-116.
- [25] J. E. Namkoong, M. D. Henderson. Wanting a Bird's Eye to Understand Why: Motivated Abstraction and Causal Uncertain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16, 64: 57-71.
- [26] J. A. Edwards.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Processing Preference and Motivation 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ausal Uncertainty and the MBTI in a Persuasion Context.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03, 37(2) : 89-99.
- [27] G. M. Breakwell. Mistrust, Uncertainty and Health Risks.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2020, 15(5) : 504-516.
- [28] J. D. Quinn, P. M. Reed, M. Giuliani, et al. Rival Framings: A Framework for Discovering How Problem Formulation Uncertainties Shape Risk Management Trade-offs in Water Resources Systems.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2017, 53(8) : 7208-7233.
- [29] J. M. Leonhardt, L. R. Keller, C. Pechmann. Avoiding the Risk of Responsibility By Seeking Uncertainty: Responsibility Aversion and Preference for Indirect Agency When Choosing for Others.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011, 21(4) : 405-413.
- [30] D. E. Brashers. Communication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1, 51(3) : 477-497.
- [31] L. A. Smith, N. Stern. Uncertainty in Science and Its Role in Climate Policy.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Mathematical, Physic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2011, 369(1956) : 4818-4841.
- [32] N. F. Dieckmann, R. Gregory, E. Peters, et al. Seeing What You Want to See: How Imprecise Uncertainty Ranges Enhance Motivated Reasoning. *Risk Analysis*, 2017, 37(3) : 471-486.
- [33] Z. Kunda. The Case for Motivated Reason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0, 108(3) : 480-498.
- [34] 李艳红, 刘佳诺. 人们为什么相信假新闻: 对“假新闻信念”的认知心理学解释. *新闻界*, 2022, 8: 14-26.
- [35] A. A. Strickland, C. S. Taber, M. Lodge. Motivated Reasoning and Public Opinion. *Journal of Health Politics, Policy and Law*, 2011, 36(6) : 935-944.
- [36] S. S. Sundar, C. Nass. Conceptualizing Sources in Online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1, 51(1) : 52-72.
- [37] W. A. Afifi, J. L. Weiner. Toward a Theory of Motiv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Theory*, 2004, 14(2) : 167-190.
- [38] C. Chang. Motivated Processing: How People Perceive News Covering Novel or Contradictory Health Research Findings.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5, 37(5) : 602-634.
- [39] E. J. Nijssen, J. J. Schepers, D. Belanche. Why Did They Do It? How Customers' Self-service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Attributions Affect the Customer-provider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Service Management*, 2016, 27(3) : 276-298.

- [40] D. A. Scheufele, N. M. Krause, I. Freiling. Misinformed About the “Infodemic?” Science’s Ongoing Struggle with Misinformation, 2021.
- [41] J. M. Miller, K. L. Saunders, C. E. Farhart. Conspiracy Endorsement as Motivated Reasoning: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Trus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6, 60(4): 824-844.
- [42] B. M. Tappin, G. Pennycook, D. G. Rand. Thinking Clearly About Causal Inferences of Politically Motivated Reasoning: Why Paradigmatic Study Designs Often Undermine Causal Inference.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 2020, 34: 81-87.
- [43] T. Bolsen, J. N. Druckman, F. L. Cook. The Influence of Partisan Motivated Reasoning on Public Opinion. *Political Behavior*, 2014, 36: 235-262.
- [44] J. D. Jensen. Scientific Uncertainty in News Coverage of Cancer Research: Effects of Hedging on Scientists’ and Journalists’ Credibility.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8, 34(3): 347-369.
- [45] M. Eisend. Understanding Two-sided Persuasion: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oretical Approaches. *Psychology & Marketing*, 2007, 24(7): 615-640.
- [46] M. J. Steijaert, G. Schaap, J. V. T. Riet. Two-sided Science: Communicating Scientific Uncertainty Increases Trust in Scientists and Donation Intention by Decreasing Attribution of Communicator Bias. *Communications*, 2021, 46(2): 297-316.
- [47] B. B. Johnson. Further Notes on Public Response to Uncertainty in Risks and Science. *Risk Analysi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3, 23(4): 781-789.
- [48] N. F. Dieckmann, E. Peters, R. Gregory. At Home on the Range? Lay Interpretations of Numerical Uncertainty Ranges. *Risk Analysis*, 2015, 35(7): 1281-1295.
- [49] S. C. Jenkins, A. J. Harris, R. M. Lark. Understanding ‘Unlikely (20% Likelihood)’ or ‘20% Likelihood (Unlikely)’ Outcomes: The Robustness of the Extremity Effect.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018, 31(4): 572-586.
- [50] S. J. Tsang. Motivated Fake News Perception: The Impact of News Sources and Policy Support on Audiences’ Assessment of News Fakenes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21, 98(4): 1059-1077.
- [51] S. Winter, N. C. Krämer, L. Rösner, et al. Don’t Keep It (Too) Simple: How Textual Representations of Scientific Uncertainty Affect Laypersons’ Attitude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5, 34(3): 251-272.
- [52] E. Das, P. Kerkhof, J. Kuipe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Fundraising Messages: The Impact of Charity Goal Attainment, Message Framing, and Evidence on Persuasion.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8, 36: 161-175.
- [53] J. Cohen.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Routledge, 2013: 4-5.
- [54] J. E. Namkoong, J. H. Ro, M. D. Henderson. Responding to Causal Uncertainty in the Twitterverse: When Abstract Language and Social Prominence Increase Message Engagement. *Journal of Interactive Marketing*, 2019, 45(1): 81-98.
- [55] A. I. Nicolaou, D. H. McKnight. Perceived Information Quality in Data Exchanges: Effects on Risk, Trust, and Intention to Use.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06, 17(4): 332-351.
- [56] J. A. Lischka, M. Garz. Clickbait News and Algorithmic Curation: A Game Theory Framework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Journalism, Users, and Platforms. *New Media & Society*, 2023, 25(8): 2073-2094.
- [57] L. Molyneux, M. Coddington. Aggregation, Clickbait and Their Effect on Perceptions of Journalistic Credibility and Quality. *Journalism Practice*, 2020, 14(4): 429-446.
- [58] V. L. Champion, C. S. Skinner, U. Menon, et al. Breast Cancer Fear Scale: Psychometr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04, 9(6): 753-762.
- [59] S. M. Jones-Jang, T. Mortensen, J. Liu. Does Media Literacy Help Identification of Fake News? Information Literacy Helps, But Other Literacies Don’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21, 65(2): 371-388.
- [60] J. M. A. Hornikx. A Review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ve Persuasiveness of Anecdotal, Statistical, Causal, 2005, 5: 205-216.
- [61] A. Hinnant, R. Subramanian, R. Young. User Comments on Climate Stories: Impacts of Anecdotal vs. Scientific Evidence. *Climatic Change*, 2016, 138: 411-424.
- [62] T. H. Freling. When Poignant Stories Outweigh Cold Hard Facts: A Meta-analysis of the Anecdotal Bias. *Organizational*

-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20, 160:51-67.
- [63] 张云昊. 科学治理的结构转型——一个分析框架的构建. 科学学研究, 2017, 11:1601-1607.
- [64] A. M. van Der Bles, S. van der Linden, A. L. Freeman, et al. The Effects of Communicating Uncertainty on Public Trust in Facts and Number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20, 117(14):7672-7683.
- [65] K. Armstrong. If You Can't Beat It, Join It; Uncertainty and Trust in Medicine.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2018, 168(11):818-819.
- [66] M. C. Politi, D. S. Dizon, D. L. Frosch, et al. Importance of Clarifying Patients' Desired Role in Shared Decision Making to Match Their Level of Engagement with Their Preferences. BMJ, 2013, 347.
- [67] 李希光, 杜涛. 超越宣传: 变革中国的公共政策传播模式变化——以教育政策传播为例.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9, 4:71-79+109.
- [68] A. Fagerlin, C. Wang, P. A. Ubel. Reducing the Influence of Anecdotal Reasoning on People's Health Care Decisions: Is a Picture Worth a Thousand Statistics?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2005, 25(4):398-405.
- [69] H. Hoeken, L. Hustinx. When is Statistical Evidence Superior to Anecdotal Evidence in Supporting Probability Claims? The Role of Argument Type.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9, 35(4):491-510.

How Cancer News Narratives Shape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Evidence-Based Health Policy: An Experimental Survey on Weibo

Nie Jingho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ai Jiaji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Policy narratives serve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veying health policies involving scientific uncertainties. Understanding the public's perception and support of policies not only helps optimiz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but also serves as a key prerequisite for enhancing policy effectiveness. Using social media cancer news as a medium for policy narrativ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evidence on public policy cognition and participation,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vidence types and scientific uncertainty. Through a survey experiment with Weibo users, the study finds that dur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cancer screening and health check policies, scientific uncertainty weakens the advocacy effect of anecdotal evidence. This process is mediated by the public's decreased trust, skepticism about the communicator's public service motives, and perceptions of "clickbait" headlines. However, statistical evidence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scientific uncertainty. By employing a policy narrative approach combined with experimental methods from behavioral science, this study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health policy communication and offer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olicy process-practices.

Key words: policy narrative; scientific uncertainty; evidence-based health policy; anecdotal evidence; statistical evidence

■ 收稿日期: 2024-07-05

■ 作者单位: 聂静虹, 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翟嘉靖, 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 上海 200234

■ 责任编辑: 刘金波